

清醒当局者



知情局外人

希腊的Panoyotis Papadimitropoulos先生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外事务了如指掌。绝大多数时候，他喜欢他所见到的一切。

他的名字看起来似乎比字母表中的所有字母还要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许多人只知道他叫“Papadim”的原因之一。当Panoyotis Papadimitropoulos先生还是希腊原子能机构的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时，他出席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届常会，自那以后他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结下了长达近50年的不解之缘。在200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迎来50周年诞辰的前夕，“Papadim”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Linda Lodding的采访，就核工业的变迁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一个50年进行了讨论。

您是如何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结缘的？

1959年，作为希腊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名年轻雇员，我随同当时的希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第一次来到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届常会。我的祖国希腊是1957年最早签署创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的创建者之一。我记得1959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大会的议程项目包括新成员问题，讨论的是接纳伊拉克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5位成员问题。

自那以后，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我不断地到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理事会及保障委员会的会议。

我清楚地记得一件事，那是大约在1961年或1962年，在我访问当时总部设在大饭店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期间，我正乘坐电梯到4层。当电梯门打开时，时任苏联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的Vyacheslav Molotov先生步入电梯。作为年轻人，我当时一眼便认出他是二战及战后冷战期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我当时的背景完全是科学背景。但自从我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外关系部门工作起，便开始有了政治思维。当时负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外关系的助理总干事是David Fischer先生。Fischer是当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了解最多的人，他知道原子能机构为什么成立，是如何成立的，它的真正使命是什么，等等。他曾作为一名南非的外交官参与了于1954—1956年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谈判，并且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筹备委员会任职。事实上，他作为原子能机构对外关系负责人长达近25年之久。他是一个真正具有政治意识的人，而他的这种政治意识在原子能机构与欧洲原子能联营就有关保障问题进行谈判时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

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期间见证了哪些主要变迁？

在原子能机构成立后的若干年里，尽管原子能机构本身仍然处于冷战期间，但是原子能机构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苏联和美国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原子能机构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平衡的基础之上，并作为一个技术组织尽可能维持

这样一种平衡。

当我于20世纪70年代加入原子能机构时，原子能机构正经历着从一个纯技术组织转为带有一定政治取向的组织的细微方向调整。在我的记忆中，使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具有“政治色彩”的主要因素包括对南非当时奉行的种族歧视政策的争论，就中东核问题及以色列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反应堆的争论，以及印度于1974年进行和平目的的核爆炸。印度的核爆炸确实给原子能机构的运作一个政治推动力。保障特别是保障视察开始触及国家主权。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有关保障事务的条款）曾一度成为各种解释的焦点。

当然，仅仅从一些数字上就能看到原子能机构的一些变迁。1959年，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400名，而现在增加到2500名。1959年原子能机构的预算是1500万美元，而现在的预算超过3亿美元。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即当今世界比以往更加险恶，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您对此怎么看？

的确是这样。数十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担负着双重责任，一是通过帮助成员国的发展来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二是通过早期探查来确保成员国的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

但是，原子能应用的扩大，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的日益增加，“9·11”事件及后续事件的发生，已经把原子能机构活动的主要部分转向防止核恐怖主义。尽管各国继续努力为保障核能安全而履行他们的责任，但是一些非国家行动者则威胁要对当今世界实施恐怖行为，以便不受国际法和秩序的制约实现他们的目的。这种威胁事实上也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敲响了警钟，迫使原子能机构大量增加反恐活动。一些无法获取核武器的集团或个人可利用放射性材料或设施在我们的社会中制造恐怖事件。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

成功实施核恐怖行为的风险还是很高的。敏感核材料的非法贩卖已证实了这点。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材料及核设施的核查及保护，对于建立成员国对不扩散事业的信心，同时对促进有益于人类的原子能和平利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国际层面上，已在加强保安及核查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例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订，《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制定、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的通过，等等。

包括我自己的祖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对2006年10月八国集团在摩洛哥拉巴特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反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原则声明》做出响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观察员出席了此次会议。希腊当局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的经验可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活生生的实例。重要的是，超过80个国家已做出将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政治承诺。

我们必须跟上挑战的步伐。每个国家都必须制订各自的保护机制，但是一个国家的行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力合作。

如果您说出3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工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名字，您认为是哪3位？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太多的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作出贡献。在秘书处以外和原子能机构内部，我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人，他们之中有些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缔造者”。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David Fischer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原子能机构合作了40多年。

我还想提及负责原子能机构保障事务的瑞士籍副总干事Rudolph Rometsch。Rometsch具有丰富的多边谈判经验。在加入秘书处以前，他曾任欧洲气体扩散铀浓缩集团的总裁。事实上，是他在过去和现在的成员国及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的协助下，在初期帮助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了保障体制。

另一位是印度人Upendra Goswami。他于1958年作为负责技术援助司的副总干事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他为建立当今的“技术合作”形式作出了贡献。现如今，原子能机构正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与各成员国开展合作，帮助他们各自开发自己的核科学技术。是Goswami真正地确立了技术援助的内容。当然，此后来自墨西哥、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对技术援助进行了改进和拓展。

在成员国中，我想提及Bertrand Goldschmidt对原子能机构作出的贡献。他作为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法国理事在原子能机构工作了23年。1956年，他率法国代表团出席原子能机构《规约》谈判大会，部分负责《规约》有关保障内容的第十二条（作为陷入僵局的大会的一种妥协方案被通过）的成功起草。

另一位有影响的原子能机构缔造者是瑞士人Paul Jolles。1957年他任原子能机构筹委会执行主席，后来任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1956—1961年）。他的功绩在于他建立了秘书处的组织结构与职能。后来他成为雀巢公司董事长。

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后4任总干事，即斯特林·科尔先生、西格瓦德·埃克隆德博士、汉斯·布利克斯博士和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博士，对原子能机构作出的贡献。

您曾作为秘书处成员就职于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也曾作为希腊代表团成员就职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您认为在像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这样的机关工作最困难的是什么？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主要作用是就原子能机构工作的主要方向促进引导和达成一致。过去，在那些主要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中，几乎都存在各种分歧。所谓的“维也纳精神”总是能有助于达成一致。在理事会期间形成的全部决定中，几乎99%是通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当然这离不开理事会成员、秘书处及总干事的协助。

达成一致是最重要的工具，但实现这一目标也是理事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工作现越来越多地变得更具政治色彩。这将对和平与安全造成某些严重后果，因为关键的是，理事会的决定继续通过协商一致来达成，以便这些决议得到应有的重视。

您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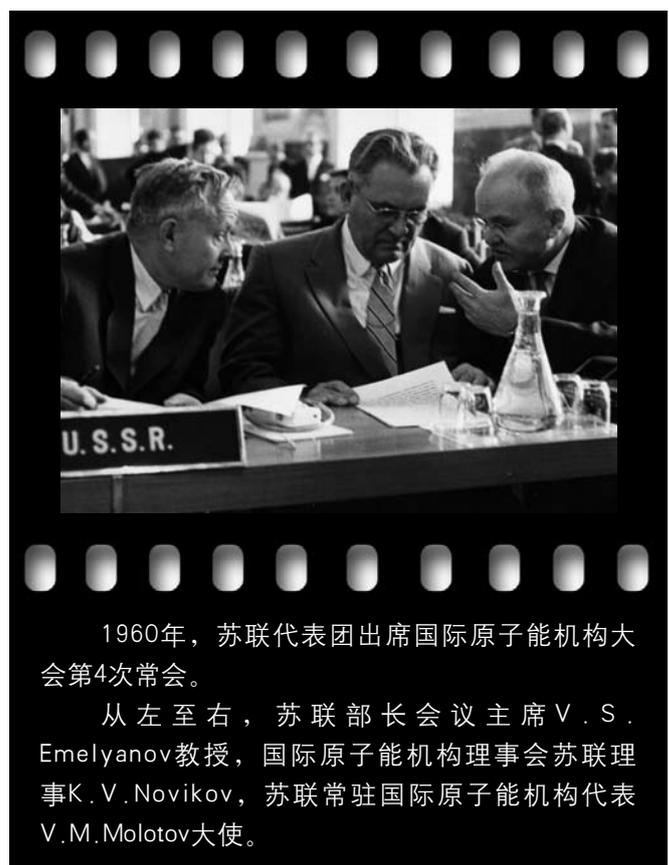
由于冷战一去不复返了，因此1946—1947年为和平应用原子能而创建一个强大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在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控制下进行核供应及燃料循环——的初期计划才得以实现。我必须提及为创建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所做的更早的计划，即著名的“巴鲁克计划”。巴鲁克计划建议创建一个国际原子能开发署，并授权它掌管或拥有所有对世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原子能活动。巴鲁克计划是“裁军前的控制计划”。该计划本该授予一个国际组织相当大的权力。

我们目前似乎正朝着实现燃料循环管理的国际化目标迈进，该目标可作为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的强大工具。国际化有助于防止核扩散，而依我看来，原子能机构在今后数十年中的作用将会得到加强。但如果公众对国际机构缺乏信心，也就没有什么方案是可行

的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进展，我们必须重振现有的机构，并使它们更有意义，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前瞻性的核不扩散政策应当包含国际伙伴关系这一要素，并主要通过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来实现这种伙伴关系。200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便是对原子能机构作用的认可。但是和平努力永无止境，需要持续地支持和加强。

几乎没有哪位外交官比您更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未来谁将会取代您的位置？

我的位子微不足道，那不是个问题。事实上，我非常乐观，因为我相信年青一代会胜任任何职位。我感觉年青一代会做很多的事情。他们工作节奏快，吸收东西快，新点子更多。因此，尽管当今普遍对原子能机构未来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但我却非常乐观，为应对社会的需要，未来的领导者将展示出更诚挚的领导风范。



1960年，苏联代表团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4次常会。

从左至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V. S. Emelyanov教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苏联理事K. V. Novikov，苏联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V. M. Molotov大使。

当然，我们今天在吸引年轻人加入到核科学领域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我们正在做一些新的尝试，世界核大学即为一例。但这还远远不够。

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世界性的“原子用于和平”机构，将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具生命力，我对此持乐观态度。